

从电影《花木兰》探析 中西语言文化映射下的人物认知

■文/邓夏

语言是文化的映射,是思维习惯的反映。尤其是视觉文化时代接受度最为广泛的影视语言,更是用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方式。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各国思维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木兰从军的故事在民族叙事与国际视野中的再现产生巨大的差异。本文从文本语言的角度出发,探讨中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人物认知。

一、家族荣耀与情感生活

中国的语言环境是注重整体的,一个人出生于家庭,死后也要落叶归根、回归家庭。所以在中国家庭生长的人,他是家庭链条的一环,言行举止代表的是整个家庭的道德品质。在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他们在语言和行为上都需要对整个家族负责,尽可能促使社会相对稳定。迪士尼版《花木兰》关注到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意识。

花木兰顶替赶鸡的行为引起了父亲和母亲的一次家庭谈话。从母亲的视角来看,“女儿通过婚姻带来荣耀,女人嫁得好才能光宗耀祖”。相亲失败之后媒婆当众指责花家:“真替花家丢脸,他们没有抚养好女儿。”当征兵令降临这个家庭,腿脚不便的花周即使年迈残疾,但是仍然义无反顾接下了帝令。“我是父亲,我只有在战场才能为家人带来荣耀;你是女儿,要清楚你的位置。”家族荣耀是父亲出战的主要原因。在宣布军中纪律的时候,同样将个人放置在集体之中进行规约,指出逃跑的行为不仅个人丢脸,更是“为家人丢脸,为你的村庄丢脸,为你的国家丢脸”。在西方的思维意识中,中国式家庭是注重家族荣耀的,人物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家族荣耀的驱使下完成的。花家把凤凰春为尊贵的祖先,请求她庇护族人,指引木兰在迷途中找到方向。凤凰涅槃的故事正是一代家族永生不灭,辉煌长存的象征。

但是迪士尼对东方文化的解读仍然是想象性的,木兰出征的背后虽然有着对长辈的孝、对国家的忠,但她永远是一个女儿身,有着中国女子的闺阁生活与儿女情长。中国人追求的和谐统一,还包含着家国意识与个人生活的协调。所以在中国影视叙事中,战争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生活、与爱情相互调剂的。在赵薇版的《花木兰》中,爱情的宣言为残酷的战争增添

了一点柔情。“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心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叙事中的爱情因素。相比于刘亦菲版的木兰为家族而战,赵薇版的木兰更像是为爱情而战。尸横遍野,那些带血的军牌在逐渐消磨地对战场的热情,对生活的希望。木兰对残酷的战争的厌恶,对战场生活的迷惘,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使得这个人物身上兼具男子的刚烈与女子的柔和。相比之下,诗歌中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在迪士尼的电影版本倾向于功利主义色彩,赵薇版的更具有现实主义情怀。

二、身份界定与文化理念

由于民族文化形态的不同,对世界的认知差异也就因国而异。中国的语言体现了向内的思维模式,从内在的生活和情感出发寻求对自身的认识。赵薇版花木兰的成长是在战场和爱情的角逐中寻找自我。中国本土的花木兰是一个有欲望、有个人感情的女性。她对战死伤场的普通战士的悲悯,对文泰的大胆追求,对生命生发的悲凉感慨,都是一个身在战场的女子所展现出的柔情的一面。她的身上有着驱逐胡虏、保卫家国的激情,更有为爱牺牲的绵绵情意。巾帼英雄与平民少女的双重身份设定让这部电影既具有时代气息,又富有生活气息。

西方的影视语言体现了向外的思维模式,通过武力征服,向外延伸和发展自我。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对人物的服饰、场景和色彩的精心搭配,是在用视觉化的叙事语言营造出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引发观众对中国古代生活的想象。它通过文本语言极力展现美国式的社会价值观,构建起了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叙事语言体系。而美国式的语言是抽象的,着力宣扬一种以自我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英雄观念,花木兰出征的中国本土故事形态只是一种宣扬美国文化形态的外在工具。

迪士尼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界定是“安静、镇定、风度、优雅、庄重、礼貌”,因为这些是作为一个好妻子的品质,也是作为妻子为丈夫服务的必需品质。而媒婆这个角色代表的正是男尊女卑性别旧秩序的卫道者与代言人。在《木兰辞》中,仅仅一句“万里赴戎

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概括了木兰十年的从军生涯。出征回归后的木兰不慕名利,仍旧回到故乡侍奉双亲,弥补对父母的亏欠。迪士尼在简短的文字间大胆扩展想象空间,将民歌中富有生活气息的木兰从军故事塑造成一位百炼成钢的英雄。西方民族追求求变、崇尚征服的个性决定了他们意识中的木兰是一个为个人认同而闯入男人世界的英雄。

当父亲劝木兰为了自身隐藏她身上的“气”时,木兰选择了妥协,但是在强敌面前,她终究暴露了自己身上强大的“气”。因为身为女子,拥有巨大能量而不能自由展示与释放,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却只能借助男儿身份,这是木兰难以言说的苦楚。指挥官的“不能让祖传的宝贝束缚你,你要培养你的天赋”引导木兰发挥个体的自由度,“释放”、“天选之人”、“伟大的战士”这些文本语言所暴露出的人物气质与中国人喜静沉稳的性格气质并不符合,却体现了一种美国的意志。刘亦菲主演的花木兰褪去了中国式女子的面貌,也脱离了男扮女装的故事情节,以女性的身份投入战争和参与拯救国家的重任,只是为了渲染女性的自由,反映了以个人本位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个人注重在环境中表现自己、征服他者。这与中国战争中的集体叙事相差甚远,个人化的叙事和华丽的武术呈现将个人征服欲望和个人英雄意识发挥到极致。中国故事的本土理念是宣扬孝道、保卫家国的集体意识与人的英勇、善良的精神,《木兰辞》民歌中的生活情态和女儿家的心理有所体现。而美国的理念是宣扬凭借个人之力可征服外部世界的个人信仰,花木兰的骨架虽在,却缺少丰满的血肉。

演绎经典故事、经典人物离不开对文化语言的解读,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表现,是导致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木兰的故事在跨地域、跨文化、跨历史的环境下不同语言表达,正是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环境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下,女性出征的传奇色彩和真切感人的生活画面展现了花木兰身上刚柔并济的中国文化精神。从中国女性到国际战士,花木兰的故事还在世界的银幕上上演。

(作者系西安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论日系体育动漫美学的符号化传播与运动设计

■文/曾小兰

作为一门新兴产业,体育动漫在文化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日系体育动漫发展强劲,将体育与动漫整合,塑造了诸多广为人知的动漫形象,而这些动漫人物也在国外广受追捧。本文将具体探讨日系体育动漫美学的符号化传播与运动设计,试图探索日系体育动漫蓬勃发展的奥秘。

一、日系体育动漫的艺术特征

日系体育动漫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第一是善用视觉艺术,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要。以造型为例,日系体育动漫完美塑造了人与物的形象,将东西方审美趣完美融合,使体育动漫呈现唯美主义特点。比如,《灌篮高手剧场版》的主角是校内篮球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有典型的欧洲人脸型特点,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NBA球员,使形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便于动漫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人物线条柔和,配合电影中的光影特效,带给观众丰富的感官效果,拉近了观众与主角的距离。夸张造型是日系体育动漫的常用手法,动漫人物经常以Q版形象出现。《灌篮高手剧场版》中的樱木花道、流川枫等Q版形象比现实人物更加圆润可爱,情绪变化伴随夸张造型,一喜一怒皆能体现戏剧感,突出了体育动漫的娱乐特点。以技术表现为例,日系体育动漫创新应用了静止画面,在动画电影中并不会显得突兀,反而能够突出主题,给予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镜头瞬间变化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不自觉沉浸其中,感受竞技体育的紧张与激烈。影片中常常会插入人物内心的独白,表达人物的特殊情感,从而丰富主角人物的形象,带给观众更多新鲜感。第二是善用听觉艺术,配合精湛的配音技巧。以配音为例,日系体育动漫的配音技术非常成熟,动漫电影作者十分重视幕后配音,将配音配乐作为动漫作品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使日本出现了一批专业素养极高的声优。声音赋予了角色人物第二次生命,配音演员的独特声线能够彰显人物个性化特点纵观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经典作品,发现很多台词都令观众记忆犹新,伴随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声优配音已经从听觉领域跨越到触觉领域,观众能够通过声音在脑海中自动生成动漫形象。以

音乐为例,日系体育动漫电影配乐也极为考究,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自己的专属音乐。场景变幻、情绪起伏、剧情转变都需要配合音乐,因此经典电影作品往往会出几首炙手可热的音乐曲目。音乐将人物勾勒得更加丰满,使剧情开展得更加顺利,让情感表达更加流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动漫电影的审美品位。

二、日系体育动漫的传播特点

日系体育动漫在本国内得到推崇,在国外也吸引了大批观众。日本国人用体育动漫电影来教育孩子,鼓励从体育入手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大多日系体育动漫电影根据漫画改编,漫画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受众群,使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相应拥有市场保障。将漫画转为电影节省了剧情编排等环节,大大缩减了制作成本。成功漫画改变成体育动漫电影,既能打响漫画的知名度,也能为动漫电影宣传造势,是双赢之举。日系体育动漫的传播媒介主要是图书、影像资料等,渠道多元为动漫电影带来了巨大利润。很多电影不仅在国外得到关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使日系体育动漫获利颇丰。深层挖掘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的传播特点,可以发现体育动漫电影传播具有符号化特征。符号是传播活动的基础,传播活动无法脱离符号存在。以符号视角看待世界,会发现生活就是被符号化的过程,主客体行为都具有符号特征。动漫电影想要投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首先要成为符号,并在媒介作用下快速传播。日系体育动漫影像可以视为符号,具有一定的审美张力,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对于日本国人来说,日系体育动漫电影传递了体育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观众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会影响观众价值观的形成。日系体育动漫成为日本文化输出的重要平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一场场精彩绝伦的体育竞赛,都让观众对日系体育动漫充满认可,甚至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在动漫电影中得到实现,平凡日子里无法获得的娱乐享受在动漫电影中找到。符号化的体育动漫形象深入观众内心,让观众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感动流泪。日系体育动漫形象符号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流变,创作者善于利用视听符号与

叙事符号,对这些符号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最终使符号成为延伸产品,使原本单一的形象成为标志性符号,有了独特的象征意义。

三、日系体育动漫作品的设计

日系体育动漫作品较多,几乎涵盖了体育运动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很多观众会特意模仿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的动作,在主角人物影响下爱上体育运动,体现了动漫电影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日系体育动漫早期作品为节省成本,动作设计比较简单,伴随动画产业的不断发展,动漫电影动作设计更加精致。与以往相比,新兴技术加持下的动漫电影表现形式更加多元,人物造型相对丰富,场景更加贴合现实,动作设计也得到突破。进入新世纪以后,以球类为主的日系体育动漫电影作品的不断发展,动作更加精良,动作流畅性明显提升,主角人物的动作起始更具真实感,保持了运动的连贯性。对日系体育动漫电影的成功原因进行剖析,会发现动作设计是关键一环,经典体育动漫电影在动作设计上潜心研究,生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动作风格。首先是写实类动作设计,大多数日系体育动漫作品都以写实类动作为主,以现实中运动员的个人动作为参照物,遵循物理运动的科学规律。这类动作设计的叙事性比较强,人物动作往往能传递主观想法。以《强风吹拂》为例,在这部作品中,人物跑步动作与现实动作基本一致,创作者着重把控了动作细节,细致描绘了角色状态,使观众更容易身临其境。灰二等主角人物的身材贴近现实,肌肉骨骼比例与运动员基本相同,动作初始点与结束点、动作幅度、动作要点也都与运动员无异,技术动作和现实动作非常接近,给人以真实感。第二是夸张类动作设计,这类动作也是日系体育动漫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夸张动作融入了创作者的想象,更能体现人物的主观情感。与现实动作相比,这些夸张动作幅度过大,改变了人体的原本结构,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很多电影都应用了夸张动作,在动作幅度和人物形体上做了调整,得到了观众的普遍喜爱。

(作者系广州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电影《我的姐姐》： 女性的多维困境、个人价值与自我救赎

■文/张婉洁

女性主义的电影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因其以细腻的手法反映现实女性困境、传递女性关怀。李丹丹在《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谈到,一部电影要被定义为女性电影涉及三个要素:以女性视角叙事,将女性作为题材,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从这三点看,2021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是一部非常标准的女性主义电影,影片以女孩安然的视角,讲述了父母去世后她与大家族成员相处、办理年幼弟弟“送养”等一系列事件,在追求个人理想以及抚养弟弟之间的矛盾中的徘徊,诠释了独立自主、不愿被父权压迫的女性意识。

一、聚焦:年轻女性的忧思

《我的姐姐》除了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具备了女性电影的共性,还在叙事对象上具备独有特征,即聚焦、放大且清晰呈现年轻女性群体的忧思与自我救赎。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热潮的女性电影有《春潮》(反映母女两代女性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送我上青云》(反映都市熟女关于生死与恋爱的经验)、《82年生的金智英》(反映婚内中年女性在东方传统父权家庭和社会结构下的挣扎)、《血观音》(反映老中青三代女性在男权主导的社会场域中的斗争)等,

内容涉及广泛,包含女性家庭、生育、情感、职场等各方面困境。而《我的姐姐》不再仅以婚姻和事业为女性故事的叙事主场,以安然年轻一代女性为主人公和第一叙事视角,清晰呈现新时代下的她所面临的困境与反困境路径。虽然影片中并行的还有“上一代姐姐”姑妈的故事线,但更多的是发挥辅助和对比的作用。

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愈加强烈,女性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更加渴望实现女性个人理想、体现个体价值。影片在反困境的呈现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年轻女性对于实现个人价值的觉醒,有意识地弱化以往女性题材电影中的家长里短,更多强化个人价值追求。影片中安然对于通过考研去往大城市实现独立的目标坚定不移,并且通过台词和复习的日常情节贯穿影片始末。甚至在地和男友的情感线中,也融入了她的考研梦想。影片将年轻女性作为叙事对象的设置,符合当下“焦虑中”的年轻观众的期待,也给曾经年轻过的观众以回顾式的反思,加上现实化的人物设定与困境呈现都非常接地气,主人公对于自我价值

的执着,让众多同辈观众看到“似曾相识”的烦恼。的确,女性困境不止是家长里短,更有年轻一代在成长中的“新烦恼”。

二、再现:父权压迫困境

在女性题材电影中,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往往是多维而复杂的。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认为,不同的社会指定了不同的,以生物差异为基础的各种角色,因此女性主义质询的目标,应该是这些角色所假定的各种文化期待。这种“文化期待”让女性存在具有附属性,不仅仅是成为独立自主的她们自己,一定程度上,她们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姐妹所承载的功能与意义被放大,使得其自主的独立价值被忽视。在《我的姐姐》中,原生家庭的压抑从她们出生开始就如影随形、贯穿生命。

以姑妈这个角色为例,姑妈在影片中是上一代“好姐姐”的形象,是被标签与定义的“姐姐”。姑妈这一辈子扮演了各种角色,但唯独没有实现她作为单

个人的底色,这是一个典型的甘愿付出、无私奉献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影片中,姑妈的境遇源于她的上一辈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写到:各种各样的话语,包括家长的话语、教育制度的话语和传媒的话语,将会彼此“勾结”以确保我们遵守“文化仪式的操演和文化规范的反复”。姑妈的母亲对于姑妈的操演贯穿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与家庭生活,为了考上中专的弟弟而放弃自己的前途,只因母亲告诉她“要紧着弟弟”,甚至小到吃西瓜这件小事都要先弟弟优先。母亲的塑造之于姑妈这个角色来说,是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意识形态对女性的现实捆绑困境。

回到主角安然身上,她也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为了生一个儿子让安然假装瘸腿残疾,在意外被计生人员识破后,安然遭到父亲毒打。这给年幼的安然烙下了痛苦的记忆,以至于弟弟对于安然来说就是一个不愿直视的存在。安然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也在家庭合影中的缺席这一细节中得到印

证,这是直接导致地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的根源。社会学家李银河谈到,这部电影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当曾经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弟弟将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安然发问:凭什么姐姐就要为弟弟牺牲自我?但这种反传统话语的排序将女性个人存在凌驾于家庭之上,必然会在大家族中遭到激烈声讨,就连饱受同样苦痛的姑妈也成为施压者,一再劝诫安然“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以至于安然带着同情但坚定地表明态度:“姑妈,你是个好女人,但我不想像你那样活!”

三、他者:被规训的两性关系

根据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身体受权力的控制可被规训和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规训语境中,女性身体被看作是一种审美工具甚至生育机器。在《我的姐姐》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安然所在的医院有一个孕早期子痫的高龄产妇,

虽然已有两个女儿,但是丈夫为了要一个儿子不顾妻子的生命危险,而面对劝说,虚弱的产妇纵然奄奄一息也坚持要生下孩子。安然无助地向她哭喊“身体是你自己的,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生个儿子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觉醒女性向另一个被规训女性的呼喊,也是对女性身体与精神被男性规训这种境况的揭示。当电影在现场所有人都默认“保小弃大”,当孕妇自己都被规训成生育大过生理健康,这深刻体现了女性身体空间已被权力所塑造。

同时,女性一直作为“他者”存在,“他者”是处于支配、被窥探的位置。在医院姑父的床前,安然用淡然又习以为常的语气告诉姑妈自己小时候曾被姑父偷看洗澡,之后的镜头不断强化姑姑的惊讶、痛苦、自责,最后埋怨地哭倒在丈夫病床前。当女性被规训至精神层面,便自愿接受权力的分配。

一部好的女性电影不仅能真实反映女性的困境与突围,还能通过少数反观多数,通过几个女性的境遇看到更多相似的群体。《我的姐姐》正视中国女性面临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困境,并展现困境中她们对自我价值与远方理想的自我救赎,呼唤对女性的多维度关怀。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教师)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被列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名单,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